

## 逃與困

--聶華苓女士訪談錄

廖玉蕙 2002.11.09.

離開愛荷華時，竟然有一點不捨。前夜的咖啡和酒香，宛然仍在空氣中浮動；而蔡琴婉轉低沈的歌聲，也依然盤旋在腦際。依戀的，彷彿是這些，細加尋思，卻又不然。那樣的夜，那樣的主人，讓人舉步離去之際，不自覺地遲疑。

藏身叢林中的小說家，懷抱著對過世丈夫的愛，聽著台灣的老歌，寫著題為《三生三世》的回憶錄。屋後草坪過去是高聳的樹叢，白日裡，不時的，有鹿群們從綠樹中走出來覓食，小說家依著幾十年來的習慣，拿食物餵養牠們，就像是父母為從書房裡出來的兒女準備晚餐。黑森森的夜裡，也許有朋友自家裡攜來好吃的東西，和小說家分享，並談文說藝。音樂繞繚的屋內，最顯眼的，是男主人離去前種下的那株烏蘿，在屋子最顯眼的一個角落，兀自生機勃發地怒長著。

屋子的幾面牆上，掛了各式各樣的面具。面具裡，有些牽繫著一段段來自各地的友情，有些則說明著主人曾經經歷的足跡。另外的一面牆上，聶華苓和 Paul Engle 的照片，仍舊以光燦的笑容面對來訪的客人。聶華苓女士一一解說著，從面具到照片，口齒清晰、語言軟脆、情感濃稠，我未語先醉。

那夜，我們在河邊的餐廳用餐後，扶醉回到聶女士的家。一邊聆聽著蔡琴低沈的歌聲，一邊喝著香醇的咖啡，一邊開懷暢談。訪談已然結束，真正的友情卻才開始。沒了錄影機，談話更是海闊天空。小說家真情畢露，招得我失態地淚眼婆娑。蔡琴的歌唱得真好！一曲〈不了情〉，讓人盪氣迴腸。可回到台北的家居，特意上街買了 CD 回來，卻再也聽不出那晚的美麗來！

廖：訪問聶華苓女士非得從《桑青與桃紅》開始不可囉！這本引起諸多議論的小說是什麼時候問世的？

聶：一九七〇年在《聯合報》副刊連載時被腰斬，出書大概是七二年，後來在香港《明報》連載。那時候香港是我們這樣的人寫作的出口，因為大陸根本就隔離了。在台灣，又這樣一下子被腰斬，甚至於還很怕連累編輯。當

然，從那以後台灣的報紙就根本也不登我的東西了。所以，作為一位作家，我在台灣等於沉默了一二十年啦！

廖：我記得是我們上大學的時候，正熱中於看它的連載，記得有一天報上突然說「來稿未到」之類的，從此這個小說就在報紙上絕跡了！

聶：主要就是一般右傾的作家們罵啦，再加上警備司令部、黨部也去干涉。怎麼那麼嚴重啊！好像我要推翻政權的樣子。我就是寫，根本就沒有想到那些問題。其實像寫北平圍城，也是寫一種人的困境，一堆人被圍在那裡，舊有的文化崩潰了，新的文化還沒有來，是那種人的精神崩潰。後來寫台灣的閣樓也是一種人的困境嘛！經過了當代中國某些大的事件，比方說：國民政府遷來台灣，共產黨整個席捲大陸！總之，我們有種逃亡的心情。我是在抗戰時期長大的流亡學生，總是逃。十幾歲就逃離家鄉，十四歲日本人來到武漢，我們就逃、逃、逃！到了抗戰勝利以後，我去了北平，共產黨來了，又逃。到了台灣，以為可以不逃了吧！結果在台灣這個島上，也在逃。我就是寫人的一種困境--總是逃，總是困。就說你在自己家裡吧，可能也在逃，我們也可能是被困在家裡面的。所以我就是寫人，尤其是現代人。我說的這個「困」是多方面的，精神的、心理的、政治的或個人的處境。

廖：可能是因為身處戒嚴沒有解除的年代，大家心裡害怕，於是產生種種揣測、比附，或者對號入座，說你是在諷刺一些什麼東西啊！

聶：對！那就是說，他們的心思太多了。自己心虛，所以總是疑心你在顛覆他什麼的。也可能因為我跟《自由中國》的關係密切的緣故，我在《自由中國》十一年，對我的影響很大。一九四九年我一到台灣，就進了《自由中國》，一直到一九六〇年雷震、傅正、馬之燻、劉子英四位先生被捕，《自由中國》被封，一共十一年。《自由中國》的殷海光、戴杜衡、夏道平、毛子水、宋文明，都是非常好的頭腦。我剛進《自由中國》時很年輕，才二十幾歲，剛剛離開大學，做了一年多編輯，後來作編輯委員。我是編輯委員會上唯一的女性，也是最年輕的。編輯委員會主要是討論社論，討論有問題的文章。他們的討論、言談、風格對我的影響很大，二十幾歲還沒有完全成型，思想、為人都還在摸索階段。現在就算是在海外，

我也應該是屬於比較開明的，對吧？

廖：後來，您的書又在怎樣的機緣下重新在台灣問世呢？

聶：一九八八年，因為余紀忠先生四處奔走，我才能回台灣。說起來真是不容易呢！去了以後，對我而言，當然就等於開禁了。《中國時報》《漢藝色研》還有其他的出版社如《林白》都開始出我的書了。所以，一九八九年，《桑青與桃紅》才又在台灣重新出版。

廖：有關《桑青與桃紅》的討論文章好多，不知道您自己看過沒有？很多論述都非常有趣，有人解讀說「青」指國民黨、「紅」指共產黨，真的是「各說各話」。有一位郭淑雅女士寫了篇《喪青與逃紅》的評論，您看過嗎？

聶：喔！是在《台灣文學》登的，這篇文章我看過。

廖：您覺得這篇文章對您小說的解讀合適嗎？您當初為何將主角命名為「桑青」及「桃紅」的？有什麼象徵意義嗎？

聶：我的想法倒沒有像郭女士那麼樣的細。說老實話，我沒有那麼想。我取了「桑青」，主要是因為中國以農為本，桑葉是很重要的，生長在中國土地上，桑有蠶吐絲的意象。青呢？當然桑葉是青色的。桃是桃紅，我本人很喜歡桃紅的顏色。在我想來，桑青可以象徵一種傳統的文化，桃紅是鮮豔的、奔放的，象徵的是迸發的生命力，就是這麼一個對照。而且，我喜歡聽人的名字，比如說我自己的名字—聶華苓，就是一種揚音。「桑青」與「桃紅」都是揚音，我之所以取「桑青」和「桃紅」的名字，除了象徵的意思，也要求音調的好聽。其實，沒想到批評家所說的那麼多。

廖：我是研究《桃花扇》的，曾經研究過桃花在中國傳統文化當中約定俗成的意涵。它有兩種非常截然不同的意象—一個往上飛昇，就是悟道，如桃花源；另外一個就是墮落沉淪的，如「輕薄桃花逐水流」的意象。正好可以拿來印證你書裡桃紅這個角色，「桑青」和「桃紅」的區別，就是天真與墮落。天真浪漫的桑青變成桃紅以後，那種放浪形骸，沉迷於肉慾，其實很符合中國傳統對於桃紅的解說。

聶：你解釋得很好，我沒有那麼深奧！我就是喜歡那兩個名字的發音和隱含的象徵。

廖：所以好的作品就是說它有多方解讀的空間？

聶：現在甚至有評論者從女性主義的角度來解讀。其實我寫的時候，並沒有想到女性主義。可是，現在我自己回頭看，尤其在七〇年代，哪有人那麼寫啊！一個女人寫成那麼的放蕩！可是我覺得那是叛逆，就是經歷過各種困境之後，壓抑出來的一種叛逆。恐怕我潛意識裡面是有女性主義的。因為我自己發現，我寫小說不論短篇、長篇，男性總是弱一點，女性強一點，這彷彿是很自然的。我在台灣的時候，就有人這樣講過。這不是政治性的女性主義，而是一種精神上的、心靈上的、意識上的，我從小就不是那種很順、乖乖的孩子。

廖：因為有點叛逆，所以，沒有刻意的想要表現女性主義，但是不自覺的就流露出來了。另外，《桑青與桃紅》裡面，有一段情節提到：桃紅畫了一張逃亡的地圖。我記得李歐梵先生曾經在一篇論文中解說這是一種國籍的認同！可是郭小姐卻剛好認為是相反的，她認為這是一種逃離，是去國界的，去邊境的，無國族主義的，是您受到在《自由中國》時的自由思想所啟迪的證據。您自己以為呢？

聶：我覺得是我野心太大了，我是寫人！因為那時，我已經接觸到很多從東歐出來的作家們，從非洲、南美來的，還有亞洲其他國家的。我所感覺到的人的困境，和各種形式的逃亡，對他們來說也是一樣。尤其那時候中歐、東歐的作家，像匈牙利、波蘭、捷克、南斯拉夫、羅馬尼亞作家，我覺得我跟他們有共同的語言，他們也覺得跟我有共同的語言，因為我們都經歷了很多相像的境遇嘛！都是一種困境。我寫《桑青與桃紅》的時候，「國際寫作計畫」已經有好幾年了，我已經接觸很多其他地區的作家。我覺得我寫的是一種「人」的困境，而不僅僅是中國人，在台灣的人，或者香港的人，或者是我自己。當然我自己也深受過這種困境。所以，她說這是「去國境，去邊界」，基本上是對的。

廖：您也曾經說過：「作家離開母語國的時候，那種生活經驗跟語言的儲蓄是很重要的。」那您是如何來儲蓄您的經驗跟語言？

聶：我離開台灣的時候，已經三十九歲，不是那麼年輕了。所以，我的母語有三十九年的儲蓄在那裡了。但語言一直都在變的，台灣、大陸都一樣，每去一次，我都發覺新的語彙，有的語彙我都不懂了！尤其是年輕人的語

彙。在海外的人多半有語言這種困擾，盡可能用中文就好。我一到美國就決定用中文寫作，我翻譯的東西其實還不少，中譯英、英譯中都有，但我覺得到了美國以後有一種漂泊、流浪的感覺。你什麼都抓不住，就只有語言稍稍能夠抓得住，就好像能夠抓住你的根，而這根不斷地長出枝幹、葉子、花朵，你又不容易抓住。所以，在海外，我們製造了自己的語言，不是台灣的，也不是大陸的，不過我們寫的別人也看得懂。本來作家就是在創造自己的語言，自己有獨特的語言，我們也只好這樣自我安慰，不斷的創造自己的語言。我一直在接觸中文的報章書籍，當然也看英文的，我也一直在用中文寫作。我的兩個女孩子中文都沒有斷過，她們甚至可以寫中文，說中文。我的丈夫 Paul Engle 真的很好，有的美國人不一定這樣的。他跟我一結婚，就跟我提兩個女兒應該保持她們的語言。他說：「你們在一起盡可能的說中文，我喜歡聽。」所以，甚至於我們四個人在一起都是講中文，他就在旁邊做他自己的事。有時候他也聽，可能抓住幾個字，他知道主題是什麼。他可以說德文，法文也可以說一點，後來他跟我說他非常遺憾沒有學中文。

廖：他能不能說一點中文？

聶：所有作家在這兒的時候，吃飯時間到了，他會敲壁爐上那個銅鐘說：「吃飯吧！」。他在吃飯的時候別人給他菜，他會說：「夠了！夠了！」。

廖：文藝界提起 Paul Engle 先生跟妳之間的伉儷情深，以及您們對於台灣來的作家的照顧，真的是非常感動。您在一九六七年提出「國際寫作計畫」(International Writing Program)，可不可以談談當初怎會想到做這樣的計畫？

聶：當初我來的時候，這兒有白先勇、王文興和楊牧。楊牧那時候叫葉珊，葉珊好像跟我是同一年來的，白先勇、王文興跟葉維廉是前一年--六三年就來了，我是六四年來的。那時候的中國作家已經有好幾位了，同時也有印度、衣索匹亞、菲律賓及其他國家的一些作家。我在台灣的時候就已經在台灣大學、東海大學教小說創作，也已經出了幾本書。但即使是這樣，還是跟他們有些隔膜。所以，作為一個作家，來的時候雖然也覺得這裡很自在，但實際上我們是外國人。有一天我和 Paul Engle 去 Iowa 河的珊瑚壩，



我等 Paul Engle 游泳上來，就跟他說：「你怎麼不辦一個特別的機構，完全是外國的作家，而且可以擴大，並不是只有我們這幾個人。」他說這個想法很有意思，有點瘋狂，但錢打哪來呢？他主持「作家工作坊」已經很不容易了，二十幾年來費了很多心血，到處募款。而且學校歡不歡迎還不一定！已經有這麼多瘋瘋癲癲的作家在校園裡，再來些外國瘋瘋癲癲的瘋子，那怎麼受得了？我說：「這個地方就是瘋子感到最舒服的地方、最適合的地方。」後來他就開始跟學校談。那時候的校長 Howard Bowen 很有國際頭腦，他說只要你辦得起來就辦吧！一開始，我們只有一個小辦公室、一個半天的秘書。第一年，1967 年，痙弦和香港的戴天來了，還來了十幾個其他國家的作家。逐漸的，大家都知道了，募款在美國是這樣的，不論你是哪一行，只要你有成就，就容易募到款。你要是毫無成就，他不一定理你。他不是真的覺得你這個事業很有理想就來資助你，他是看你這個理想已經很有成績，或是你這個人很有名氣。他們信任 Paul Engle，他已經很有名了嘛！所以募款就比較容易。國務院看「國際寫作計畫」的成績愈來愈好，就在各國大使館的文化處，直接給作家們研究金到這兒來。

廖：這些作家來了以後，都做些什麼？

聶：剛開始的時候，我們有一個學年，八個月。後來沒那麼多錢，何況人太多了，我們也沒有辦法。當然我們的工作人員是越來越多，幫助也多了，可是錢得來不易。我們是學校裡的教授，可是作家的錢是從外面來的，所以愈來愈難，要維持一個學年很不容易，我們精神上也受不了。後來就六個月、四個月、三個半月，現在是兩個半月。兩個半月以後，他們到美國國內旅行差不多兩星期，共三個月。這兩個半月裡，你願意參加活動就參加，不參加也可以。活動安排得很多，討論會、朗誦會，還有派對，喝酒呀！瘋呀！還有別的人要請客，Iowa City 附近的其他城市也邀請全體作家。他們要寫就寫，不寫也可以。

廖：曾經來過此地的作家都非常思念這個地方，知道我要來，還再三交代代為  
向您問候。你們對這些朋友的照顧，讓他們真的很難忘懷。

聶：大陸劇作家陳白塵就說：「聶華苓比中國人還中國。」那個時候像痙弦、

吳晟、陳映真、柏楊、林懷民、姚一葦、王禎和、喬禽、鄭愁予，還有其他國家很多作家，他們都是第一次出國。而且很多作家我們都是堅持一請再請。當然，他們的錢是由本地的大使館文化處出的，但是，我們推薦邀請的人，他們多半都會尊重並接受，因為我們了解當地的文學情況。

廖：要對當地有一定的了解，才知道要邀請哪些人。

聶：對，我和 Paul Engle 去過很多國家，亞洲、南美洲，歐洲，就是非洲還沒有去過。

廖：這真是一個很有意思的計畫，到現在還一直維持著嗎？

聶：我退休後，有一個時期不太好，因為有些問題。不過，過去兩年，我們又請了一位新的主持人 Christopher Merrill，是位詩人，也是非小說類的作家。他寫了一本書，有關巴爾幹戰爭的書，被人評論是非小說類的美國經典，只有四十幾歲，很有親和力，頭腦非常好。要主持這個計畫，就要有遠見，看得遠一點，他有這個特點，所以很好。

廖：現在有沒有台灣人在這個計畫裡？

聶：沒有，現在主要是沒有錢啊！有一段時間是《聯合報》和《中國時報》，一家報社出一個人的錢，李昂、蕭颯、季季、黃凡都是這麼來的。可是後來我退休之後，他們就出不出錢了。我真是希望台灣有人來。大陸有作家來，因為美國有些基金會出錢，但他們限定是要從大陸來的。我們這裡學校的「亞太研究中心」，最近申請到兩百萬，這個基金會給你錢是有規定的，一定要大陸來的作家。每年有一位中國作家從大陸來。他們覺得台灣一直都很開放，跟外面接觸機會很多；大陸那麼大，又在變，人才又多，所以他們就是有錢要捐的話，都是限制要給大陸作家。今年從大陸來的五位作家，都是這樣的情況。小說家李銳，詩人西川，小說家蔣韻，導演和劇作家孟京輝，電影劇作家廖一梅。

廖：我聽說在一九七七年，您曾經被三百多名世界各地的作家提名為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？

聶：我和 Paul Engle 兩個人。當時，他們發起的時候，三百多個作家就都寫信給「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」。美國也有一、二十位寫信給他們，比方說前

駐蘇聯大使哈里曼，還有世界銀行的副總裁這樣的人。可是那年根本就沒有給獎，我們沒得到。大概是他們覺得沒有人夠資格吧！

廖：可不可以趁這個機會談談您平常的閱讀經驗呢？

聶：我什麼都讀！你看我這裡中文書也有、英文書也有，反正抓著什麼讀什麼。我的書很多，我們已經捐了三千多冊的書到圖書館。書多到已經氾濫了，都放不下了。在美國，當然美國的東西得接觸，如報紙、雜誌、書籍。我一直沒有中斷中文報紙，很謝謝《聯合報》和《中國時報》，他們一直送我。許多是作家朋友送的，另外，我自己也找些文學、歷史方面的書來讀。床頭放的《紅樓夢》《聊齋》是百讀不厭的，還有唐詩宋詞。我也看歐美當代的文學作品。當然，當代的中文作品，是非讀不可的。

廖：能不能以您這麼多年的寫作經驗，給喜歡寫作的的朋友一些建議？

聶：因為小說是寫人，所以關於人事、世事、閱讀都很重要。我對很多東西都有興趣。剛開始寫作的時候也許不容易，要靠慢慢累積，除非是天才。大半都不是天才！天才沒有幾個，一般就是慢慢地自己寫出自己的路子來，不斷地寫、不斷地寫，就能夠把握了。把握你的語言、把握你的題材、把握你的主題，就是不斷地在那練功夫。不過，一般寫小說的人好像就自然對世事、人事很有興趣，對亂七八糟的東西都有興趣，連閒言閒語也不放過！

廖：從前您提到說：「報紙是創作小說素材一個很重要的來源」現在依然是這樣的嗎？

聶：對啊！到現在依然喜歡。五、六十年代的台灣，社會新聞有專門一版。這些社會新聞可以让你了解這個社會、了解人。比方說：《桑青與桃紅》裡面提到的報紙資料，就是我從台灣帶來的。我另外有一本長篇小說就是根據《華僑日報》上的一小則消息，加以鋪陳改編而來。1964年我從台灣出來時很困難。所有的信根本就不能帶！報紙比較沒有關係，因為是當地出的，到現在我還留了一大堆。其實，不只是報紙上的，對現實生活裡面的人，我也是蠻有興趣的。比方說我去台灣，就是去看朋友，去大陸也是。大陸最近這些年來改變很多。在大陸和台灣，有人要我去看風景，我就說：「我不要在風景，我要看人景。」



廖：談談您到美國這麼多年來的生活狀況吧。

聶：自從到了 Iowa 之後，精神上就整個的解放了，生活上非常豐富，接觸面也很廣，知識、文學、人文各方面，對我當然都很有影響。我跟 Paul Engle 的生活，除了我們都是搖筆桿、敲打字機的人，也一同主持「國際寫作計畫」。以前我們在舊辦公大樓裡是鄰居，上午在家裡做自己的事情，寫作什麼的。我們下午一同開車去學校，五分鐘就到了。我們的辦公室對著河，下午回來也是一起回來。回來時，也許想買點菜，就一起去買菜；家裡需要釘東西，沒有釘槌，就到五金店去買個釘槌，生活上點點滴滴都是在一起。出去旅行固然在一起，甚至於接受榮譽博士，也是兩個人同時接受的。當然個人有個人的另外一套，但是像本州州長給的「文學成就」就是一起接受的，美國五十州的州長給的獎，也是我們倆一起接受的。就是說我們的私生活和工作都在一起，常常就是我說上半句，他接下半句，正是我要講的；或是他說上半句，我接下半句，也正是他要說的。

我們走過很多地方，去過很多國家。一九九一年，我們計畫去歐洲兩個月，兩個人一起去波蘭接受瓦勒沙新政府的「文化奉獻獎」。然後，再去捷克會見哈威爾總統及南斯拉夫、芬蘭、波蘭等地的老朋友，也要去波羅地海的那些小國家及德國，因為 Paul Engle 的祖先是從德國黑森林來的。那時，我的女婿、女兒、外孫都在德國，女婿是德國外交官，他們剛好從北京調回德國，我們準備去看他們，結果在機場 Paul Engle 突然倒了。他沒有毛病的！我們預備上飛機，他說：「我到那個角落去幫你買一本 Newsweek 在飛機上看。」我說：「你去吧！」他就把他的東西都交給我，等到別人都上飛機了，我想他怎麼還不來？就去找他。找到的時候，發現他已經倒在地上了。有人在給他急救、搶救，我一看到他就知道完了。送去急救中心不到五分鐘，醫生跟一位神父一起出來，我就知道了。那件事對我的打擊很大，差不多兩、三年恢復不過來，生活簡直是....。

廖：非常意外？

聶：非常意外！高高興興上路，上路的那天早上，他還在種烏蘿，他很會種花。我看見地上攤著一些土，就對他說：「我們要走了。趕快種上去呀！我們還得兩個月才回來。」他就把它種在盆裡了，到現在長成這麼濃密的

樣子。我一定要好好把它保存下去，已經十一年了，他過世已經十一年了。

廖：長得很好！

聶：剪過一次了，它曾經長到這邊來。他過世兩三年之間，我也像是死了。不只是因為我們在生活上各方面那麼樣融洽，感情那麼好，尤其是他突然倒了，完了。幾分鐘之內，整個天翻地覆，你怎麼受得了！

廖：對他來講是幸福的，沒受苦。

聶：對，但對我而言打擊太大！後來，我就開始整理他的回憶錄。他有很多文章在那裡，我收集起來，經過選擇，編輯出版了。然後另外一本是關於「作家工作坊」的，對他很重要，那個我就比較吃力，有一部份是他自己寫的，有一部份請他以前的學生寫。可是四〇年代、五〇年代我不在愛荷華，有的作家我不認識，我就請當時在這裡的一位詩人叫 **Robert Dana** 來接手。當時已經完成五分之四了，他就接手過去，又添了一些作家的文章。完成之後，我就對他說：「放你的名字吧！」這也花了好多年的時間。

整理這些回憶錄時，很不舒服。看到這些文章就等於聽到他的聲音一樣。工作一陣子，我就要出去開車跑一跑，做點別的事，這樣也耽誤了點時間。把他這兩部書整理出版之後，就開始寫我自己的回憶錄。活了這麼一大輩子，經歷了很多事情。回憶錄的題目是「三生三世」，從大陸到台灣，後來又到美國，三個不同的世界。現在再不寫的話，就寫不出來了！老啦！

廖：進度如何？

聶：已經寫了五分之三。

廖：在您寫的〈苓子是我嗎？〉這篇文章裡，您曾經說過：「寫作是為了擺脫寂寞。」您現在還是同樣的心情嗎？

聶：寫作一定要寂寞，你必須要忍受寂寞，不然的話就沒有辦法。也不一定是擺脫，是要忍受得了寂寞。我現在雖然是一個人，但是也有很多事情。最近兩年，因為 **Merrill** 要我參與「國際寫作計畫」的顧問工作，我就又「顧」又「問」起來了。不過，主要還是寫回憶錄，在寂寞中回想前塵。

廖：除了寫回憶錄之外呢？近況如何？台灣的文友都很掛記您哪！

聶：Paul Engle 過世以後，生活很孤獨，也很豐富，說起來很矛盾。我朋友不少，而且對我都非常好，美國朋友、中國朋友都是，常常有人找我去吃飯。朋友裡面有一個很好的韓裔美籍的藝術家，是我在美國最好的一個朋友，名字叫朱晶嬉。我常常跟她在一起玩，不是玩就是吃啊，到處跑啊。她也瘋瘋癲癲的，我們可以開車兩個多鐘頭，就爲了吃一頓墨西哥飯，是交往三十年的老朋友了。還有一些中國朋友和美國朋友，在 Paul Engle 過世以後，這些朋友對我特別的好，有的是 Paul Engle 跟我一起認識的，有的是我後來認識的。也有一些比我年輕的，昨晚就有兩位美國年輕朋友帶了自己做的點心，到我家裡來喝酒、聊天，一聊聊到十二點多，捨不得走。

就像妳剛才說的，我好像比較接近現代。我也比較接近美國，大概因爲是我跟 Paul Engle 結婚的關係，所以比很多中國作家、中國人，更投入美國社會。比方說選舉吧！我就是關心得不得了！他們的選舉，譬如議員的選舉、總統選舉，我不只是喜歡看選舉的競爭、辯論，也把它當戲看。選舉把人的優點、弱點，美的、醜的都暴露出來了，也展現了人世變遷、權力更迭、人生無常。這都是戲！我目前的生活可以說：隨興、隨意、隨緣。。我當然非常非常想念 Paul Engle，真的是無時無刻不想他。

廖：您這兒的居住環境真美！我記得您稱呼這個地方叫「鹿園」，平常有鹿出入嗎？

聶：有！每天下午我會出去餵鹿，現在還不會出來，有十幾隻鹿。

廖：那些鹿會不會傷人？

聶：不會傷人，牠怕人，你一出來牠就會跑掉。那些本來都是野鹿，後來都被我們餵成家鹿了，有公鹿、母鹿、小鹿，我們餵了二十幾年了。牠們吃一種玉米跟鳥食混合的飼料，以前都是 Paul Engle 餵，他過世以後，我就延續了這個傳統。冰天雪地我也去餵，就灑在那山坡頂上，牠聞到了就會自己出來吃。現在是五、六隻，冬天山谷裡沒東西吃，就會有十幾隻跑出

來。鹿昂頭走出樹林的姿態特別好看。鹿是六親不認的，公鹿來了就把母鹿趕走，母鹿來了就把小鹿趕走，公鹿母鹿一起來，小鹿就會自己走開。有時候我忘記撒鹿食，牠們就在那個坡上，朝這裡望著，非常有趣。

廖：謝謝您抽空接受採訪！我們期待您的回憶錄《三生三世》早日完成。